

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析

董雅浩¹, 牟佳琪², 刘佳伟³, 邓博夫²

(1. 成都理工大学 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9; 2.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3.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 基于中国特色的法定代表人制度, 以 2006—2021 年沪深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 探究了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是否引发审计师的风险应对行为。研究发现, 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企业, 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费用。机制检验发现, 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后, 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增多, 使得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以应对企业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 内部控制质量、非控股大股东、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负向调节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对资本市场投资者识别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变动产生的风险变化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民营企业; 审计收费; 风险应对

[中图分类号] F23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3)03-0035-09

一、引言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审计师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环境, 对被审计单位的风险进行判断。当审计师面临较高的审计风险时会采取诸如提高审计收费、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等行为, 以应对客户带来的审计风险^[1-6]。作为审计关注的重点之一, 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审计师对公司的风险感知^[7-11]。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对审计师行为的研究至关重要, 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问题^[3, 12-13]。

围绕如何从法律制度建设和司法角度规范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降低法律风险, 法与金融的经典文献已经将法律制度的作用引入到公司治理理论框架中^[14-17]。然而, 一些明显具有中国特色法律条款及其所引致的特殊公司行为和审计之间的关系被以往文献所忽视, 其中包含了我国独有的法定代表人制度。《民法典》(2020)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规定,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 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 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 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 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可以看出, 法定代表人享有直接经营管理的职权和对外代表企业的权力。同时法人公司面临民事和刑事诉讼时, 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一旦满足责任要件, 必须承担个人的法律责任。

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特征恰好为本文探究法定代表人制度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场景。首先, 我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具有个人化特征, 其在创立企业初期一般直接担任公司的董事长, 兼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但 2005 年版《公司法》第十三条对法定代表人的选任条件进行了修改, 并非以往仅由董事长才能担任, 该条款的修改给予了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自由裁量权。其次, 实际控制人享有的决策权力与承担责任的不对称, 导致大股东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进而带来负外部性的经济后果^[18]。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转出直接降低了个人法律责任监督力度, 但对公司的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实际控制人手中, 其个人权力与承担责任的不对称程度进一步加剧, 而审计师将产生何种风险应对行为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22-11-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21YJC6300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0216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JBK2207025)

[作者简介] 董雅浩(1993—), 男, 山西临汾人,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从事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研究; 牟佳琪(1996—), 女, 四川乐山人,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研究; 刘佳伟(1991—), 男, 安徽安庆人,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从事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研究, 通讯作者, E-mail: 15802847066@163.com; 邓博夫(1987—), 男, 四川简阳人,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研究。

鉴于此,本文以2006—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是否会引发审计师的风险应对行为。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企业,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费用。机制检验发现,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后,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增多,使得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以应对企业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非控股大股东、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负向调节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实际控制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这一独特的视角,补充了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因素。已有文献对实际控制人特征的关注包括性别、婚姻、股权质押等方面^[19-20],鲜有文献关注到实际控制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的行为。第二,延续法与金融文献的研究脉络,借助法定代表人制度将法律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延伸至实际控制人个人法律责任监督的层面。以往文献普遍关注国家或者地区之间法律环境制度的差异对公司治理的影响^[14-17],本文走进具体的法律条款探究了其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第三,从实践意义来看,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体现为其个人法律责任的加强,对投资者而言应当关注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变动的风险信号,有助于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983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首次提出,由董事长担任合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而后法律法规对不同企业也确立了法定代表人的地位,例如:集体企业厂长是法定代表人,公司制企业董事长是法定代表人。^①2005年版《公司法》第十三条对法定代表人的选任条件进行了修改,并非以往仅由董事长才能担任法定代表人,该条款的修改使得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可以选择转出自身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则意味着个人法律责任的加重,通过梳理《民法通则》(1986)、《民事诉讼法》(1991)、《合同法》(1993)、《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8)、《会计法》(20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20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2017)等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可以看出法定代表人存在的意义在于其作为自然人承担了与公司关联的个人法律责任。^②《民法典》(2020)关于法定代表人法律责任的限定也愈加明晰,第六十二条对法定代表人的责任也进行了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现有文献基于法学研究对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废立进行了集中讨论,并且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21]。支持废除法定代表人制度的文献认为,法定代表人的权力是法律直接授予,法定代表人的唯一性和法定性特点与现代治理结构存在矛盾,法定代表人有碍于公司治理的发展^[21-24];相反观点认为,法定代表人制度在公司制企业实际运行中并未体现出绝对的权力集中,仅仅代表实现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法定代表人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法律连带责任^[25-28]。探究掌握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后的经济后果,有助于为上述争论提供理论研究的经验证据。对外部治理的重要角色审计师行为的检验,为探究此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视角。

当审计师面临较高的审计风险时,会产生风险溢价,提高审计收费以应对客户带来的审计风险和潜在的诉讼风险^[1-6]。作为审计关注的重点之一,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审计师对公司的风险感知^[7-11]。

^①《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第四十五条规定,“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1)第三十一条规定,“集体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负责,是集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1993)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②《民法通则》(1986)第四十九条,“除法人承担责任外,对法定代表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民事诉讼法》(1991)第四十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8)第四条提到,“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并对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2015)将法定代表人所承担的连带责任衍生至其家庭,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将被限制消费措施,在乘坐交通工具、住宿娱乐场所、旅游度假以及子女就读等方面不得进行高消费。

例如,当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时,风险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审计收费^[2,29-30]。当公司董事会成员存在“问题董事”、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时,审计机构获得真实财务信息的难度加大,审计师的审计风险越高,会提高其审计收费作为风险补偿^[10,31]。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中法定代表人的角度,将其作为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可以丰富公司治理与审计师行为研究领域的文献。

(二) 研究假设

我国民营企业大多是由创始人或创始人家族建立,他们往往掌握着企业大部分股权,形成较为集中的股权结构特点。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民营企业大股东通过交叉持股或金字塔结构控制企业,导致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达成对企业的控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时,大股东理性经济人下的最优选择,是通过掌握控制权和以利益输送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产生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即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此时,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成为市场监管的重点。法与金融的经典文献认为,监督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核心要素的是法律因素,不同国家法律制度建设的差异,导致了公司治理存在不同程度的第二类代理问题^[14-16]。在我国公司治理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定代表人制度。结合民营企业大股东自然人特征和股权集中的基本事实,法律因素能够通过具体的责任条款,解释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下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假说。

根据法律制度和条款对法定代表人的界定,经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犹如一把双刃剑,具有两层意义:一方面赋予其法律形式上的“一把手”身份;另一方面,承担法定代表人身份也与企业相关的个人法律责任从法律形式上对个人与公司的风险进行了捆绑。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虽然降低了个人法律责任的监督力度,但由于其个人对董事会的控制权,决策权力并未被减弱。根据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假说,实际控制人享有的权力与承担责任的不对称,可能会引发诸如关联交易、大股东资金占用等掏空行为。因此,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后恶化了公司治理水平,导致企业的经营业绩变差引发企业风险的增加。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审计师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环境,对被审计单位的风险进行判断。当审计师面临较高的审计风险时会采取提高审计收费的行为,以应对客户带来的审计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

H: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公司,审计师提高了审计收费。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6—2021 年沪深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法定代表人等信息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在此基础上与公司年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数据对法定代表人信息进行核对整理。实际控制人、审计师行为、其他财务数据及公司治理信息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在样本筛选过程中,本文剔除了无实际控制人的样本、实际控制人为多名自然人时名单不确定的样本、金融行业的样本、ST 公司的样本以及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 1% 的缩尾处理。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借鉴现有文献的方法^[2,32-33],本文构建模型(1)来探究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对审计师风险应对的影响。

$$AUDITFEE = \beta_0 + \beta_1 LEGALOUT + \beta_2 TOP1 + \beta_3 DUAL + \beta_4 INDEPRATE + \beta_5 DIRECTORNUM + \beta_6 ROA + \beta_7 LEV + \beta_8 \ln SIZE + \beta_9 ARINV + \beta_{10} BIG4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1)$$

被解释变量为审计收费(AUDITFEE),采用公司当年审计费用除以总资产衡量,为保证数据可读性,在此基础上乘以 10000。同时,本文采用公司当年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lnAUDITFEE)衡量审计收费进行稳健性检验。核心解释变量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若实际控制人不担任法定代表人取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包括:股权集中度(TOP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DUAL,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 1,否则为 0)、独立董事比例(INDEPRATE,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的比重)、董事会规模(DIRECTORNUM,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盈利状况(ROA,总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LEV,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lnSIZE,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业

务复杂度(*ARINV*,应收账款与存货之和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是否“四大”(*BIG4*,若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1,否则为0)、行业(*INDUSTRY*)与年度(*YEAR*),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审计收费(*AUDITFEE*)的均值为4.169,说明样本中审计收费的平均金额占总资产的0.4169%。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转出(*LEGALOUT*)的均值为0.241,表明有24.1%的样本实际控制人不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前人文献基本一致。

(二)主回归结果

本文根据模型检验了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对审计师风险应对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列(2)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是否影响审计收费的结果,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的回归系数为0.51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在考虑其他因素可能对审计师风险应对的影响后,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费用,从而支持了本文研究假设。

(三)稳健性检验

1. 个体固定效应。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的回归系数为0.20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即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费用。

2. 替换变量衡量。本文采用公司当年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ln *AUDITFEE*)衡量审计收费。如表4列(2)所示,在审计收费替换变量衡量后的回归结果中,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实证结果不变。

3. 未来期间审计风险应对。为避免因果倒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未来1~4期的审计收费替代同期的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列(1)至列(4)所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4. 倾向得分匹配法。由于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在0.05的卡尺范围内,对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的样本进行1:1的最近邻匹配。匹配结果如表6所示,在匹配的样本中各变量在是否转出法定代表人的组别没有显著的均值差异。在匹配样本下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7列(1)所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的回归系数为0.51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5. 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为进一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阶段根据地区法治水平和公司层面的特征对实际控制人是否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回归,求得逆米尔斯比率(*LAMBDA*)。在主回归模型中加入逆米尔斯比率(*LAMBDA*)后重新回归,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回归结果如表7列(3)所示,逆米尔斯比率(*LAMBDA*)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同时,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实证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审计收费	<i>AUDITFEE</i>	审计费用/总资产 $\times 10000$
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	<i>LEGALOUT</i>	若实际控制人不担任法定代表人取1,否则为0
股权集中度	<i>TOP1</i>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两职合一	<i>DUAL</i>	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1,否则为0
独立董事比例	<i>INDEPRATE</i>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的比重
董事会规模	<i>DIRECTORNUM</i>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盈利状况	<i>ROA</i>	总资产收益率
财务杠杆	<i>LEV</i>	资产负债率
企业规模	\ln <i>SIZE</i>	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业务复杂度	<i>ARINV</i>	应收账款与存货之和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是否“四大”	<i>BIG4</i>	若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1,否则为0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AUDITFEE</i>	20129	4.169	3.530	0.367	3.260	23.222
<i>LEGALOUT</i>	20129	0.241	0.428	0.000	0.000	1.000
<i>TOP1</i>	20129	0.327	0.138	0.090	0.306	0.704
<i>DUAL</i>	20129	0.385	0.487	0.000	0.000	1.000
<i>INDEPRATE</i>	20129	0.377	0.052	0.333	0.364	0.571
<i>DIRECTORNUM</i>	20129	2.086	0.187	1.609	2.197	2.485
<i>ROA</i>	20129	0.046	0.069	-0.312	0.048	0.220
<i>LEV</i>	20129	0.374	0.199	0.045	0.356	0.911
\ln <i>SIZE</i>	20129	21.665	1.070	19.303	21.553	24.880
<i>ARINV</i>	20129	0.277	0.151	0.013	0.259	0.721
<i>BIG4</i>	20129	0.028	0.164	0.000	0.000	1.000

表3 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VARIABLES	(1) AUDITFEE	(2) AUDITFEE
LEGALOUT	0.342 ** (2.14)	0.514 *** (5.68)
TOP1		-0.103 (-0.41)
DUAL		0.143 ** (2.41)
INDEPRATE		1.377 * (1.85)
DIRECTORNUM		0.055 (0.23)
ROA		-1.413 *** (-2.65)
LEV		3.113 *** (8.39)
lnSIZE		-2.730 *** (-36.53)
ARINV		-1.531 *** (-5.10)
BIG4		2.315 *** (12.92)
_CONS	4.087 *** (77.22)	61.788 *** (37.35)
N	20129	20129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R ² _A	0.038	0.547

注:括号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表4 稳健性检验:个体固定效应与替换变量衡量

VARIABLES	(1) AUDITFEE	(2) lnAUDITFEE
LEGALOUT	0.206 ** (2.04)	0.023 * (1.75)
TOP1	-0.396 (-0.70)	0.048 (0.67)
DUAL	0.160 ** (2.31)	0.007 (0.71)
INDEPRATE	0.729 (0.84)	0.148 (1.18)
DIRECTORNUM	0.526 * (1.81)	0.066 * (1.71)
ROA	-0.341 (-0.74)	-0.228 *** (-4.02)
LEV	1.791 *** (4.81)	0.061 (1.59)
lnSIZE	-3.266 *** (-27.22)	0.294 *** (26.89)
ARINV	-1.278 *** (-2.92)	-0.002 (-0.04)
BIG4	1.908 *** (6.27)	0.412 *** (7.28)
_CONS	73.226 *** (26.74)	6.986 *** (26.41)
N	19731	19731
FIRM	YES	YES
YEAR	YES	YES
R ² _A	0.756	0.832

注:括号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表5 稳健性检验:未来期间审计风险应对

VARIABLES	(1)	(2)	(3)	(4)
	F1_AUDITFEE	F2_AUDITFEE	F3_AUDITFEE	F4_AUDITFEE
LEGALOUT	0.596 *** (5.98)	0.541 *** (4.93)	0.491 *** (4.20)	0.475 *** (3.63)
TOP1	-0.139 (-0.53)	-0.330 (-1.15)	-0.584 * (-1.90)	-0.783 ** (-2.34)
DUAL	0.081 (1.34)	0.016 (0.24)	0.001 (0.01)	-0.010 (-0.11)
INDEPRATE	0.847 (1.09)	0.585 (0.69)	1.000 (1.07)	1.145 (1.10)
DIRECTORNUM	-0.182 (-0.71)	-0.403 (-1.46)	-0.467 (-1.53)	-0.605 * (-1.77)
ROA	-5.120 *** (-8.45)	-6.339 *** (-8.54)	-6.940 *** (-7.98)	-7.234 *** (-7.27)
LEV	2.689 *** (6.64)	2.557 *** (5.94)	2.441 *** (5.30)	2.178 *** (4.54)
lnSIZE	-2.414 *** (-31.09)	-2.195 *** (-27.48)	-2.004 *** (-23.92)	-1.855 *** (-20.10)
ARINV	-1.625 *** (-5.03)	-1.561 *** (-4.42)	-1.601 *** (-4.07)	-1.345 *** (-3.00)
BIG4	2.145 *** (12.31)	1.875 *** (10.22)	1.567 *** (7.70)	1.387 *** (6.10)
_CONS	55.677 *** (32.30)	51.445 *** (29.06)	47.264 *** (26.49)	44.170 *** (22.75)
N	16714	14047	11821	9799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R ² _A	0.524	0.459	0.403	0.360

注:括号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表6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均值差异检验

VARIABLES	LEGALOUT=0		LEGALOUT=1		MEANDIFF
	N	MEAN	N	MEAN	
全样本:					
TOP1	15280	0.332	4849	0.313	0.019 ***
DUAL	15280	0.435	4849	0.228	0.207 ***
INDEPRATE	15280	0.379	4849	0.373	0.006 ***
DIRECTORNUM	15280	2.082	4849	2.099	-0.017 ***
ROA	15280	0.052	4849	0.027	0.025 ***
LEV	15280	0.352	4849	0.442	-0.090 ***
lnSIZE	15280	21.622	4849	21.801	-0.178 ***
ARINV	15280	0.279	4849	0.273	0.006 **
BIG4	15280	0.027	4849	0.029	-0.003
匹配样本:					
TOP1	3603	0.321	3775	0.320	0.001
DUAL	3603	0.248	3775	0.262	-0.014
INDEPRATE	3603	0.374	3775	0.373	0.000
DIRECTORNUM	3603	2.094	3775	2.095	-0.002
ROA	3603	0.036	3775	0.037	-0.000
LEV	3603	0.413	3775	0.417	-0.004
lnSIZE	3603	21.797	3775	21.788	0.009
ARINV	3603	0.278	3775	0.278	-0.000
BIG4	3603	0.034	3775	0.031	0.003

6. 控制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由于审计收费可能受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为了额外控制这一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会计师事务所变更(AUDITCHANGE)的控制变量,若公司当年被审计的事务所发生变更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8列(1)所示,控制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7. 控制高管变更导致的影响。由于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可能原因包括公司当年发生了高管变更,为控制这一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高管变更(MANCHANGE)的控制变量,若公司当年有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变更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8列(2)所示,在控制高管变更导致的影响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表7 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与 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

VARIABLES	(1)	(2)	(3)
	AUDITFEE	LEGALOUT	AUDITFEE
LEGALOUT	0.515 *** (5.23)		0.536 *** (5.93)
LAWLEVEL		-0.021 *** (-3.76)	
TOP1	-0.718 ** (-2.04)	-0.393 ** (-2.28)	-0.906 *** (-3.15)
DUAL	0.232 ** (2.44)	-0.456 *** (-10.36)	-0.754 *** (-4.47)
INDEPRATE	1.488 (1.28)	-1.260 ** (-2.47)	-1.002 (-1.18)
DIRECTORNUM	-0.070 (-0.21)	-0.202 (-1.30)	-0.295 (-1.20)
ROA	-0.592 (-0.65)	-1.974 *** (-8.48)	-5.016 *** (-6.16)
LEV	3.743 *** (6.99)	0.771 *** (5.56)	4.543 *** (9.89)
lnSIZE	-2.788 *** (-26.05)	0.025 (0.90)	-2.677 *** (-35.85)
ARINV	-1.917 *** (-4.65)	-0.813 *** (-4.85)	-3.092 *** (-7.47)
BIG4	2.360 *** (10.86)	0.002 (0.02)	2.299 *** (12.63)
LAMBDA			2.475 *** (5.78)
_CONS	63.186 *** (26.50)	0.269 (0.37)	59.561 *** (35.40)
N	7378	20129	20129
INDUSTRY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R ² _A/R ² _P	0.574	0.106	0.550

注:括号中为 *t* 值或 *z* 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四) 机制检验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证明,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增加了审计收费,其作用机理有待检验。企业实际控制人转出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行为动机更符合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假说,增加了其掏空行为。那么,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会导致企业更多的关联交易和大股东资金占用,增加了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立如下模型检验关联交易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的中介作用是否成立。

$$RLAT = \beta_0 + \beta_1 LEGALOUT + \sum CONTROLS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2)$$

$$AUDITFEE = \beta_0 + \beta_1 LEGALOUT + \beta_2 RLAT + \sum CONTROLS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3)$$

$$TUNNELING = \beta_0 + \beta_1 LEGALOUT + \sum CONTROLS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4)$$

$$AUDITFEE = \beta_0 + \beta_1 LEGALOUT + \beta_2 TUNNELING + \sum CONTROLS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5)$$

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为关联交易(*RLAT*),等于公司当年关联交易金额加1的自然对数,并将其加入模型(3)中进行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大股东的资金占用(*TUNNELING*),采用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将其加入到模型(5)中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列(1)中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后企业的关联交易规模有所增加。列(2)的结果表明,加入关联交易(*RLAT*)变量后,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的回归系数为0.503,影响程度相对表3有所降低,并且SOBEL检验*Z*统计量为4.920,说明关联交易在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收费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同样,表10的机制检验结果中,列(1)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LEGALOU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实际控

表8 稳健性检验:控制会计师事务所变更、高管变更的影响

VARIABLES	(1)	(2)
	AUDITFEE	AUDITFEE
LEGALOUT	0.509 *** (5.65)	0.483 *** (5.27)
TOP1	-0.096 (-0.39)	-0.132 (-0.53)
DUAL	0.144 ** (2.43)	0.152 ** (2.57)
INDEPRATE	1.367 * (1.84)	1.371 * (1.85)
DIRECTORNUM	0.061 (0.26)	0.036 (0.15)
ROA	-1.346 ** (-2.54)	-1.477 *** (-2.77)
LEV	3.095 *** (8.40)	3.100 *** (8.35)
lnSIZE	-2.729 *** (-36.67)	-2.707 *** (-35.93)
ARINV	-1.515 *** (-5.09)	-1.513 *** (-5.04)
BIG4	2.309 *** (12.86)	2.300 *** (12.89)
AUDITCHANGE	0.272 *** (3.29)	
MANCHANGE		0.307 *** (6.78)
_CONS	61.721 *** (37.55)	61.264 *** (36.71)
N	20129	20129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R ² _A	0.548	0.549

注:括号中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后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更多,审计风险有所提高。列(2)的结果同样表明,大股东资金占用在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从而导致审计收费的提高。

表9 机制检验:关联交易的中介作用

VARIABLES	(1)RLAT	(2)AUDITFEE
LEGALOUT	0.393*** (4.35)	0.503*** (5.55)
RLAT		0.029*** (4.89)
TOPI	0.280(0.86)	-0.111(-0.45)
DUAL	-0.231*** (-2.84)	0.150** (2.53)
INDEPRATE	-0.392(-0.43)	1.388* (1.87)
DIRECTORNUM	-0.109(-0.46)	0.058(0.24)
ROA	-1.412*** (-3.01)	-1.372** (-2.57)
LEV	5.900*** (22.05)	2.940*** (7.80)
lnSIZE	1.170*** (29.51)	-2.764*** (-36.84)
ARINV	0.698** (2.23)	-1.552*** (-5.18)
BIG4	-0.380** (-2.47)	2.326*** (12.96)
_CONS	-8.704*** (-8.26)	62.044*** (37.42)
N	20129	20129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R ² _A	0.311	0.548
SOBEL 检验 Z 值		4.920***

注:括号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表10 机制检验:大股东资金占用的中介作用

VARIABLES	(1)TUNNELING	(2)AUDITFEE
LEGALOUT	0.005*** (3.89)	0.491*** (5.47)
TUNNELING		4.777*** (2.79)
TOPI	-0.010*** (-3.40)	-0.053(-0.22)
DUAL	-0.001(-0.89)	0.147** (2.50)
INDEPRATE	0.029** (2.03)	1.237* (1.70)
DIRECTORNUM	-0.003(-1.09)	0.069(0.29)
ROA	-0.075*** (-4.46)	-1.053* (-1.96)
LEV	0.047*** (5.95)	2.890*** (8.02)
lnSIZE	-0.005*** (-4.01)	-2.708*** (-36.81)
ARINV	-0.020*** (-3.18)	-1.437*** (-4.87)
BIG4	0.001(0.59)	2.309*** (12.93)
_CONS	0.105*** (4.78)	61.286*** (37.22)
N	20129	20129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R ² _A	0.106	0.552
SOBEL 检验 Z 值		6.212***

注:括号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五、进一步分析

(一)内部控制质量

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企业把控自身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风险防范能力,降低企业违规等方面的风险^[34]。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35],本文采用迪博数据库提供的内部控制指数的自然对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代理变量(IC),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和审计师风险应对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如表11列(1)所示,交互项LEGALOUT×IC的回归系数为-0.039,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缓解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正向影响。

(二)非控股大股东

已有研究表明,非控股大股东能够通过监督和制约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约束企业实际控制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36-37]。借鉴现有文献,本文构建非控股大股东的虚拟变量(MLS),若公司存在持股超过10%的非控股大股东取1,否则为0,探究非控股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对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之间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1列(2)所示,交互项LEGALOUT×MLS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非控股大股东的存在能够监督和制约实际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审计收费增加的影响。

(三)审计委员会独立性

审计委员会监督职能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38],降低企业的审计风险。本文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角度,检验审计委员会履职能力对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之间关系的影响。审计委员会独立性(ADP)采用独立董事人数在审计委员会中的占比来衡量,将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中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2列(1)所示,交互项LEGALOUT×ADP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积极履职有助于缓解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正向影响。

(四)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体现了审计师的专业水平、经验判断的专业能力,有助于发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功能^[39]。借鉴前人研究^[40-41],本文使用行业组合份额法,基于上市公司总资产平方根计算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EXPERT),探究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是否影响法定代表人转出对审计师风险应对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2列(2)所示,交互项LEGALOUT×EXPERT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事务所行业专长的提

高,审计师能够凭借其专业能力缓解对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的风险感知,从而降低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表 11 进一步分析:内部控制质量、非控股大股东的调节作用

VARIABLES	(1)AUDITFEE	(2)AUDITFEE
LEGALOUT	0.727*** (5.81)	0.638*** (5.41)
IC	-0.556** (-2.26)	
LEGALOUT×IC	-0.039*** (-2.76)	
MLS		0.244*** (3.73)
LEGALOUT×MLS		-0.380*** (-2.59)
CONTROLS	YES	YES
_CONS	65.049*** (29.73)	61.505*** (37.80)
N	20129	20129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R ² _A	0.550	0.548

注:括号中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表 12 进一步分析: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调节作用

VARIABLES	(1)AUDITFEE	(2)AUDITFEE
LEGALOUT	5.698*** (4.86)	1.320*** (9.69)
ADP	-0.569(-0.92)	
LEGALOUT×ADP	-7.834*** (-4.46)	
EXPERT		1.335*** (7.33)
LEGALOUT×EXPERT		-3.971*** (-8.46)
CONTROLS	YES	YES
_CONS	61.472*** (37.03)	59.651*** (35.50)
N	20129	20129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R ² _A	0.554	0.553

注:括号中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回顾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法律制度建设对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规范化的成果可见一斑。无论是《证券法》的修订,还是《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的印发,都凸显了资本市场执法司法体系建设对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自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到法人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法定代表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角色,在公司制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往来和法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06—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是否会引发审计师的风险应对行为。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企业,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费用。机制检验发现,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后,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增多,使得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以应对企业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非控股大股东、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负向调节法定代表人身份转出与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一方面丰富了从风险角度探究审计师行为的相关文献,另一方面基于法定代表人制度关注了实际控制人权力与责任分离下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对如何优化民营企业公司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高的实际价值。鉴于此,本文得到如下启示和建议: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归属在民营企业独特的公司治理特征下具有重要的实际影响。政策制定者要求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水平、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审计委员会发挥监督职能以及提高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有助于缓解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带来的风险增加。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的配置,参照审计师行为的变化,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解读和判断企业未来的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 [1] 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18(1):161-190.
- [2] 翟胜宝,许浩然,刘耀泓,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J]. 管理世界,2017(10):51-65.
- [3] Pratt J,Stice J D. The effects of client characteristics on auditor litigation risk judgments,required audit evidence,and recommended audit fees[J]. The Accounting Review,1994,69(4):639-656.
- [4] Menon K,Williams D D. Long-term trends in audit fee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2001,20(1):115-136.
- [5] Hay D C,Knechel W R,Wong N. Audit fees: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upply and demand attribute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6,23(1):141-191.
- [6] 文雯,冯晓晴,宋衍衡. 公司债券违约与审计师风险应对[J]. 会计与经济研究,2020(4):3-23.
- [7] Tsui J S L,Jaggi B,Gul F A. CEO domination,growth opportunities,and their impact on audit fe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Auditing & Finance,2001,16(3):189-208.
- [8] 蔡吉甫. 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关系研究[J]. 审计研究,2007(3):65-71.
- [9] 郑莉莉,郑建明. 制度环境、审计声誉机制与收费溢价[J]. 审计研究,2017(5):78-86.

- [10] Habib A, Bhuiyan M B U, Rahman A. "Problem" directors and audit fe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019, 23(1): 125-143.
- [11] Eulawi B, Al-Hadi A, Duong L, et al. Audit pricing and corporate whistleblower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Australian financial firms[J]. *Accounting & Finance*, 2022, 62(2): 2339-2384.
- [12] Krishnan J, Krishnan J. Litigation risk and auditor resignation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7, 72(4): 539-560.
- [13] 张俊瑞, 刘慧, 杨蓓. 未决诉讼对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研究[J]. *审计研究*, 2015(1): 67-74.
- [14]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3): 1131-1150.
- [15]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1): 3-27.
- [16]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3): 1147-1170.
- [17] Allen F, Qian J, Qian M.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57-116.
- [18] 郑志刚, 胡晓霖, 黄继承. 超额委派董事、大股东机会主义与董事投票行为[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10): 155-174.
- [19] 马云飙, 石贝贝, 蔡欣妮. 实际控制人性别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7): 136-150.
- [20] 肖金利, 潘越, 戴亦一. "保守"的婚姻: 夫妻共同持股与公司风险承担[J]. *经济研究*, 2018(5): 190-204.
- [21] 殷秋实. 法定代表人的内涵界定与制度定位[J]. *法学*, 2017(2): 14-27.
- [22] 顾敏康. 公司法法定代表人的比较研究[J].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1998(1): 49-53.
- [23] 柳经纬. 论法定代表人[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13-21.
- [24] 叶林. 公司治理机制的本土化——从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相分离理念展开的讨论[J]. *政法论坛*, 2003(3): 17-24.
- [25] 方流芳. 国企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权力和利益冲突[J]. *比较法研究*, 1999(1): 419-438.
- [26] 徐彦冰. 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弊端及其完善[J]. *法学*, 2004(7): 10-13.
- [27] 杨继. 中国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存废[J]. *现代法学*, 2004(6): 125-132.
- [28] 蔡立东. 论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J]. *法学论坛*, 2017(4): 14-23.
- [29] 刘佳伟, 周中胜. 企业无实际控制人与审计收费[J]. *审计研究*, 2021(3): 51-61.
- [30] 张俊瑞, 余思佳, 程子健. 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影响审计师决策吗? ——基于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17(3): 65-73.
- [31] Lee J E.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audit pricing: Evidence from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J]. *Accounting & Finance*, 2018, 58(4): 1201-1229.
- [32] 吉利, 牟佳琪, 董雅浩. 环境规制、异质性企业环保投入策略与审计费用[J]. *财经论丛*, 2022(3): 56-67.
- [33] 汤泰劫, 吴金妍, 马新啸, 等.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审计收费——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0(1): 68-77.
- [34] 李百兴, 王博, 卿小权. 内部控制质量、股权激励与审计收费[J]. *审计研究*, 2019(1): 91-99.
- [35] 杨德明, 史亚雅. 内部控制质量会影响企业战略行为吗? ——基于互联网商业模式视角的研究[J]. *会计研究*, 2018(2): 69-75.
- [36] 姜付秀, 马云飙, 王运通. 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 [J]. *管理世界*, 2015(5): 147-159.
- [37] 朱冰, 张晓亮, 郑晓佳.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J]. *管理世界*, 2018(7): 151-165.
- [38] 潘珺, 余玉苗. 审计委员会履职能力、召集人影响力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1): 108-118.
- [39] 郝东洋, 王静. 审计师行业专长降低了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吗? ——基于法制环境与产权性质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15(3): 132-144.
- [40] 徐亚琴, 宋思淼. 审计师能识别企业的杠杆操纵吗? ——基于审计意见视角的实证检验[J]. *审计研究*, 2021(6): 102-115.
- [41] 李辰, 刘巍, 游家兴. 高薪薪酬激励的团队协同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21(3): 72-83.

[责任编辑: 苗竹青, 杨志辉]

Actual Controller Statutory Representative Status Transfer and Auditor Responses to Risk: Evidence of China's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DONG Yahao¹, MOU Jiaqi², LIU Jiawei³, DENG Bofu²

(1. School of Busines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ese statutory representative system, using a sample of A-share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6 to 2021, the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actual controller's statutory representative status transfer on auditor responses to risk in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study finds that audit fees are relatively higher for firms whose actual controllers transfer out the statutory representative status. The mechanism test finds that actual controller's statutory representative status transfer increases the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and large shareholder tunneling, and thus triggering auditor responses to risk.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s, non-controlling majority shareholders, audit committee independence, and industry expertise of audit firms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er of statutory representative status and auditor responses to risk. This study is useful for capital market investors to identify changes in risk due to statutory representative status transfer of private companies.

Key Words: statutory representatives; actual controllers; private companies; audit fees; responses to risk